上海教师

《上海教师》丛书 卷二

主编 刘国平

吕型伟：见证中国教育30年

改革开放30年教育重大事件

改革开放30年教育隽语选

于漪 永久的纪念

金忠明 葛大汇 唐安国 新时期教育关键词中的价值观轨迹

骆玉明 关于“师道尊严”

顾骏 刘国平 “两纲”教育对学校德育体系整体建设的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海教师》丛书·卷二

吕型伟：见证中国教育30年

主　编　刘国平
副主编　周家明　陈雪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型伟:见证中国教育30年/刘国平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上海教师丛书)
ISBN 978-7-5617-6009-3

Ⅰ.吕… Ⅱ.刘… Ⅲ.教育—研究—中国 Ⅳ.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4489号

《上海教师》丛书·卷二

吕型伟:见证中国教育30年

主　　编　刘国平
丛书题字　徐匡迪
责任编辑　曹利群
审读编辑　徐庆蓉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马方路　朱晓琼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7
字　　数　154千字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
印　　数　8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009-3/G·3480
定　　价　14.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上海教师

徐匡迪

目录

2 吕型伟:见证中国教育30年 / 申叔时
17 改革开放30年教育重大事件
32 改革开放30年教育隽语选
39 永久的纪念 / 于 漪
41 上海市基础教育办学条件的现代化建设 / 刘期泽
43 尊师重教谱新篇 / 黄良汉
45 新时期教育关键词中的价值观
轨迹 / 金忠明 葛大汇 唐安国
52 关于“师道尊严” / 骆玉明
56 随笔(两则) / 苏 军
59 由语文教师撕毁《哈利·波特》谈起 / 赵志伟
63 “两纲”教育对学校德育体系整体建设的
贡献 / 顾 骏 刘国平
70 政治教学和以人为本理念 / 藏 丹
73 从“汉语热”看留学生的心理问题 / 李婉滢
75 把新的教学理念带进数学课堂 / 范江伟
78 形成性评价在任务型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 杨 嵘
80 DIS物理实验教学之优势 / 李明宇
83 “学会倾听”是学琴之要诀 / 黄 骅
86 单元主题性美术课程开发研究 / 金 雯
88 护理高职生求职心理现状调研 / 徐 玲 林 岑 邵 瑜

91　通往《史记》阅读的一座“桥梁” / 石　莉
93　读史札记 / 司马牛
97　银行理财产品:遭遇尴尬 / 钱梦圆
101　书频道 / 顾晓鸣

《上海教师》丛书

顾问
胡正昌　姚庄行　吕型伟　刘期泽

《上海教师》丛书专家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漪(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会长、著名语文特级教师)
王厥轩(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研究员)
尹后庆(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邓伟志(社会学家、上海大学教授)
陈玉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金志明(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总编辑)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教授)
顾泠沅(上海教育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顾　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徐碧美(香港大学副校长、教授)
袁振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编委会主任
吴圣苓(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社长)
黄良汉(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夏玲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会主席)

编委会副主任
高洁敏(上海教育报刊总党委副书记)
史国明(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秘书长)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平　王小柳　王立强　王伟鸣　王懋功　毛长红　孙惠明
李学红　刘国平　杨国顺　沈卫国　陈宇卿　周国明　陆建国
竺建伟　赵连根　徐界生　徐　虹　倪　明　唐海宝　顾　锋
顾筱璞　楼伟俊

主　编　刘国平
副主编　周家明　陈雪良
编　辑　姚子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吕型伟：见证中国教育30年

申叔时

● 当有人称吕型伟为“教育家”时，他说：“还是在‘家’前面添个‘之’字较为妥帖。我是教育之家。我，我的妻子、儿子、女儿，都是当老师的，我们共同的名字叫‘吕老师’。”

● 一个人在教坛驰骋70余载，已属罕见。而其事业主要成就于退休之后，更属罕有。1977年，他已经度过了花甲之年，当芸芸众生乐滋滋地退居家园颐养天年时，他却选择了奋进，选择了与时代同行，酷似孔老夫子当年的“栖栖一代中”。这，我们可以名为特有的“吕型伟现象”。

● 说吕型伟是教育改革的“活化石”，虽略感失雅，却颇觉神似。“化石”者，指的是古代生物的遗体、遗物，埋在地下变成像石头一样硬化的东西。化石是研究生物演进的主要依据。可以说，在吕型伟的言行和著述中，的确凝聚着正渐次远去的30年教改的“遗体和遗物”，将吕氏作为研究30年教育巨变的资料，弥足珍贵。不过，吕氏的思想至今没有板结，仍充满着生气和活力，因此以“活化石”名之，可谓既传神又妥帖。

● 吕型伟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许多教育思想常出于教育之外。”这是确实的。他的思想境界比较宏阔，他常常从农村、从工矿、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汲取教育改革的源头活水。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 吕型伟说：“本质上说，我不是一个教育官员，而是一个思想者。”这是大实话。30年来，他基本上是用属于自己、也属于那个时代的思想在说话。“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果失去了这一点，也就失去了吕型伟之为吕型伟的一切。



历史就是已经逝去并永远无法回归的岁月，用孔圣人的话说，历史是“逝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是不能复制的，正像谁也不能叫春水倒流一样。

历史不能复制，然而却可以复述。用以复述历史的最紧要的资料是历史见证人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人和事。惟其如此，历史的见证人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为了反思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教育，我们需要寻访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很快，人们的目光聚焦到了有教育改革“活化石”之誉的吕型伟身上。把他老人家看作改革开放 30 年教育巨变的见证人，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当我们坐进他那被书籍铺天盖地占领而显得空间局促的书房，与他聊起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教育时，吕老显得相当兴奋。他如数家珍般滔滔不绝地叙说起 30 年的教育。

我们交谈中间有个小小的插曲，有趣而耐人寻味。

谈话开始不多久，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位女同志叩门而入，她带来一位 40 岁左右、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龙江市银行职员的深情问候。这位正值盛年的银行职员，用一封书写得毕恭毕敬的信告诉吕老，他正在做一件也许对他的人生会起作用的大事，就是寻访 100 位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名人，请他们签名题词，以资留念。读着这样一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的来信，吕老笑了，笑得很甜，很率直，很真情。他想了想，在这位银行职员寄来的孔子纪念封上题上“科教兴国”四个大字，并在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我们注视着这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似乎对吕老这 30 年来的所作所为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1. “文革”结束后，教育的第一要务是拨乱反正。“拨乱反正”的“正”何所指？吕老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我们自己的教育学”的高校 60 条、中学 50 条、小学 40 条、幼教 30 条。作为当年制定中学 50 条的实际参与者，他有诸多感慨，诸多期盼。

吕老郑重其事地说：“说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教育，不能不提当年教育上的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条战线都有拨乱反正的问题，而教育尤为突出。”

此言不假。“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文艺和教育作为突破口的，在整整 10 年间，教育领域真可以说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

一大批全国解放后长期活跃在教育领域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遭受残酷的迫害，

有的还被迫害致死。

学校长期停课，学生的学业荒废，红卫兵运动冲击了整个社会，危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和发展。

高考制度被废除，致使日后国家的可用之材短缺，人材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大批“智育第一”、“师道尊严”、“读书无用论”，打乱了教育教学计划，破坏了学校秩序，搞乱了教育思想，以交“白卷”为荣，教师的形象被歪曲得不像样子。

“四人帮”粉碎后，在这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不搞拨乱反正能使教育走上正轨吗？不搞拨乱反正教育能振兴吗？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不错，得拨乱反正，那么，那个拨乱反正的‘正’该是什么呢？”吕老沉思着，幽幽地向我们发问。不等我们作答，他就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正’，很大程度上是集中体现在高校 60 条、中学 50 条、小学 40 条、幼教 30 条内，因为那是建国后教育教学经验的最完整的总结，也是最切合实际的理论提升。”

吕老从《中国教育年鉴》中找出这四个文件，郑重其事地展示给我们看。他说：“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教育文献，凝聚了解放初到‘文革’前一代教育人的心血。当年毛泽东主席读了这些文件后，曾经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学啊！’毛泽东主席的话，体现了这些文件的分量和价值。”

接着，吕老又说：“就拿《全日制中学暂行条例》(50 条)来说吧，它起步于 1951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中等教育会议讨论制定的《中学暂行规程》，颁发施行后，在实践基础上几经修订。到 1961 年 7 月开始正式起草 50 条。整个起草过程就是总结经验、研究问题、改进工作的过程，它的总体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当时委托上海、陕西、河北等省市的教育厅(局)分别草拟，然后交由中央文教小组讨论、研究，形成文件，由中共中央于 1963 年正式批转试行的。从时间跨度上讲，如果从 1951 年算起，有 12 个年头，如果从 1961 年算起，也有近两年的时间了。”

我们知道，吕老是这些历史性文件的历史见证人，又是中学 50 条的实际起草人之一。我们请他回顾一下当年的情况。他略一沉吟，然后颇为自得地告诉我们：“接到中央的指令以后，马上组成了文件起草班子。班子成员都是既有相当领导能力，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还有相当文字功底的人。班子组成后，马上分头下基层搞调查研究。我们把上海市区及郊县的各类中等学校都作了详尽的了解和分析，并与搞基础教育的同志共商对策和改进措施。几个月下来，大家的心中都有了些底，班子成员再集中起来交流、讨论、分析，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了扎实的文本。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文本是好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在‘文革’中虽然作为靶子被一再批判，但它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心中一直有着很重的分量。‘文革’结束后，中央有关部门对文本进行部分技术性修改后重新颁发了这一文件，作为中等学校的工作指导方针。拨乱反正重又‘正’到了中学 50 条上。”

我们问：“毛主席曾经兴奋地称这 60 条、50 条、40 条、30 条是我们的教育学，现在看这个提法站得住脚吗？”

吕老顶真地回答：“基本上站得住脚。当时承认拨乱反正的‘正’该是这些文件，该是这些文件反映的思想和实际。应该承认这些文件是站得住脚的。”

吕老还饶有兴味地向我们讲述了“文革”前到南京师大附中蹲点搞教改的一段

往事。那时，条件很差。热天，连个电风扇都没有，但吕老一行照样听课、座谈，搞调查，推进教育改革。吕老回顾说："我到现在还认为，那次改革是对的，同现在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非常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在做中学，在活动中学，同时也让学生打好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基础，但要求不要太高，内容不宜过多。"

2. 1977 年秋冬的恢复高考，被世人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当年，吕老与 570 万重新获得高考权的考生一样欢欣鼓舞，所不同的是他想得更深刻，更久远。亲历过"王老五之耻"的他，不能同意"回到十七年去"的提法。他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坚持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为上海争来了高考自主权。从此，改变了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之后，不少省市也相继获得了高考自主权。

这里要说的不是 1977 年恢复高考那档子事，但作为背景必然要涉及到"恢复高考"这一惊天动地的历史转折。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席卷整个神州大地，高考当然也在席卷之列。这一年的 6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认为因为"高考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所谓"彻底改革"云云，实际上将是彻底取消高考，此后的 10 年间，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后来，虽说恢复了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但文化考试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1973 年《辽宁日报》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报导。说在文化考中交了白卷的张铁生，"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此后，谁敢再重提高考，尤其是高考中的文化考试？

1976 年 10 月 6 日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一片欢腾，各条战线呈现出了勃勃生机，教育当然也不例外。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并且明确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1977 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也批转教育部《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标志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今天 50 岁上下的中年人都是深得恢复高考之利的，对当年听到恢复高考喜讯时的激情，至今应该是记忆犹新的吧！

经历了太多人生沉浮的吕老，当时正在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的任上。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他有诸多的欣喜，也有诸多的忧思，更有诸多的遐想和追索。解放后高考的一幕幕景象，似重又呈现在眼前。

记得 1959 年时，在当时全国高考的序列中，福建省名列第一，而素来以基础教育扎实著称的上海却只名列第五。当时任上海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的吕老被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召去，当头一句就是："你怎么考了个'王老五'出来？"接着就命他率团到福建去取经。在福建当然学到了人家不少东西。但是，有两个问题总是在吕老脑中挥之不去：

一是中国那么大，这样划一的考试是不是公平？更彻底地说，是不是有利于教育的发展？上海的情况的确与其他地方有点不一样，外省市几十万人中最多只有 10％的人能进入大学，而上海就很不同。上海教育资源丰富，50％的考生甚至更多人都能上大学。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不比录取的百分比，而比入学线，不合理，也不科学。

二是有些地方是让学生加班加点、补课补习把高考分搞上去的。吕老一直认为，那样做的代价是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那样做，即使把名次搞上去了，有什么意义

呢？教育是要引导学生健康发展，而不是相反。

由于落了个“王老五”的外号，一些人总想不断地去追逐高分。吕老却总是说：“我们国家那么大，有些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是‘非洲水平’，十多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不合理。得改。”

高考恢复了，吕老从内心讲当然认为是件好事。但好事要办好。再说，恢复高考并不等于回复原状。为了更能说明问题，他得找依据。

记得邓小平在恢复高考后不久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一位名人说过，中国人办事，即使你是对的，有道理的，也要“上借仙气，下借民气”。有了邓小平的这几句话，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借到了“仙气”，就有了“尚方宝剑”！就师出有名了。至于“民气”，那是不待说的，谁不希望上海的高考更出彩一点呢？

吕老先找分管文教的副市长谈了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这位副市长沉思了半晌，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上头也不会同意的。”吕老说：“你答应了，我就到上头去要，我自己去。”副市长先是不松口，后来吕老一再坚持，他才说：“你去试试看，只要上头答应了，我们就办。”

吕老在等待时机。一次，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来上海视察。吕老对分管文教的副市长说：“这几天教育部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看他好吗？”副市长答应了。他们一起来到教育部部长下榻的延安饭店，汇报过工作后，吕老马上把话题引到高考上。他说：“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批评不少。教育部何必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的表扬，不好的批评，那反倒主动。”部长有点犹豫，反问道：“那样行吗？”吕老答道：“可以的，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还大，一个省的教育局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部长说：“就是怕搞乱。”吕老说：“不会的。部里制定一些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让下面搞，上头决策，怎么会乱？”部长最后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他地方怕不行。”吕老要的就是这句话，当时他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好事多磨。后来又有了几度周折，但在吕老的紧盯软磨下，上海高考实行单独命题、单独考试的自主权终于是拿到了手。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问吕老：“看来，这只是一个开始，它对中国整个的高考制度是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吧！”吕老说：“那是肯定的，后来，拿到高考自主权的省市远远超出了上海一家。上海带了个头，是个好头。我以为这是上海的光荣。”

过后，吕老又说：“当然，事情总不是十全十美的。在上海高考改革上我仍有诸多遗憾。我当时的设想是：根据上海的实际，初中毕业后实行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进普通高中，这些学生毕业只要会考合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到大学二年级时要实施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上大本，一部分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易’的不正常状况。”

我们急切地询问：“这个设想不是很好吗，后来为何没有实施呢？”

吕老一仰身笑笑，说道：“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我本身来说，拿到高考自主权后不久，我就离休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有些话我也就不太好说了，就是说了人家听不听又是个问题了。从客观上说，我设想的步子较大，社会、家庭、考生，

以及相关的领导部门，要接受这些说法和提法，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是怎么也急不得的。”

我们觉得，吕老说得在理。历史总是螺旋形发展的。有些道理一时可能被搁置下来了。（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到了某个骨节眼上，说不定又会被旧话重提，理论的锋芒也会重新显露出来，才能真正实现其理论价值。

我们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也深深地相信着。

3. 一位时代巨人为景山学校的题词，使吕老怦然心动。在当时全国悄然无声的境况中，他振臂一呼，毅然决然地在上海掀起学习景山学校“三个面向”题词的热潮；接着北上京华，争取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的支持，召开研讨会，使“三个面向”的指示家喻户晓，由此锁定了当代中国教育的走向。

拨乱反正后，教育工作建立了正常秩序，走上了正轨。此后，教育的走向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有人提出“回到十七年去”，作为资深教育家的吕型伟觉得不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兴起，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前沿科学正越来越强劲地影响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每一领域，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的教育怎么可以走回头路呢？但是，中国教育究竟向何处去，吕老一时还想不太清楚。

1983 年金秋的一天，吕型伟在报上看到一则简讯：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教育这条战线上摸爬滚打了半个世纪的吕老，目光在这“三个面向”上停住了。他闭目静思，觉得这“三个面向”实在太好了，太及时了。我们国家正在走向现代化，我们的教育难道不应该“面向”它吗？20 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化进程大为加速，我们的教育难道不应该与之相适应吗？教育本身就是面向明天的事业，在当前的形势下，教育不应该更加强调一下先走一步吗？想到这些，吕老有点坐不住了。他去找三五好友聊聊，大家都感到这一题词的意义非同一般。

可是，遗憾得很，对“三个面向”的题词，有关领导没有表态，整个教育界似乎也反应平平。

吕老有点纳闷，也有点焦急。他想：“如此重要且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题词，难道报纸登过就算数了？那不是应付了事吗？”

不能！不能这样！——吕老强烈地表示。

于是，他决定要走的第一步就是：开个像模像样的研讨会，以期引起各方的重视和关注。吕老把上海重点中学的校长，复旦、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请来，假座上海中学，对这一题词进行专题讨论。

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人们的激情就喷薄而出。

用不着谁在事前做什么组织工作，发言热烈而自发地一个接着一个，接连不断。会议从那天的下午一点半，一直开到傍晚六点，还是欲罢不能。复旦大学的领导着实被感动了，说：“我看今天就这样，下次这个会继续在我们学校开吧！”后来，这会在复旦又开了整整半天，大家感到还是言犹未尽，于是华东师大的领导又说：“到我们学校再开吧！”会议在那里又续开了一天，大家才算尽兴而去。

吕老给了大家启示，大家给了吕老信心。通过这次研讨会，他对邓公的“三个面向”题词的战略意义更加深信不疑。他决心要把这一题词“搞大”，务必使每一个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华儿女人人心中都明白。

吕老决定就“三个面向”在上海的巨大反响，写成一份会议纪要。带着这份会议纪要，吕老直奔北京，直面有关领导。吕老说：“上海开了个会，反应非同一般，建议把‘三个面向’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加以宣传。”对方的回答有点冷淡，说：“领导的题词多得很，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哪能都拿来作指导思想。”吕老坚持道：“领导的题词的确多得很，但这一题词非同一般。”这次吕老与相关领导之间的谈话，可以说是小有不快——吕老的冲动没有感动对方，对方的淡漠也难以动摇吕老把题词“做大”的决心。

吕老进一步决定，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去直面教育部党组书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张承先仔细地听取了吕型伟的一番讲述，连声称“好”，说：“好，要大力宣传！”最后，吕老争取到国家副主席王震的支持，决定以中国教育学会的名义发起召开一次“三个面向”讨论会。

1984 年 7 月 28 日——其时离小平题词发表已将近一年，中国教育学会在中央党校召开了“三个面向”学术讨论会。王震、胡启立等领导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热烈的讨论，统一了认识，一致体会到“三个面向”题词深刻揭示了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本质联系，充满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为我国教育改革确立了战略方向和指导方针。之后，吕老又在一个国际教育论坛上作了“三个面向与中华人文精神关系”的主题发言，推动了人们对“三个面向”的进一步理解。

吕老告诉我们：“这是一段往事，我原本不想旧事重提。只是近期张承先的回忆录问世了，其中用重笔浓彩讲述了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的宣传历程，尤其点到了当年上海教育界所起的作用，这样，我就不得不在这里说说了。”

4. 改革开放后，多少年来“一号文件”都是讲“三农”的。很自然，吕老也把目光聚焦到农村教改上。“一个小学富一个村，一个中学富一个乡”，这就是他那宏大而壮阔的教育理想。

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中，怎样搞好农村教育，一直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脉的大问题。在解放初期，文盲充斥着我国的农村，扫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当务之急。到了改革开放的年月，识字教育已不成问题。怎样进一步发展农村教育，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我们在与吕老交谈中谈到了教育均衡的问题，所有公民公平地享有教育权的问题。吕老说：“农村教育当然关系到教育均衡的问题，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教育最尖锐的问题却是所培养的人的走向问题。不少农家子弟上了中学，上了大学，甚至名牌大学，出了成果，成了人才，可是留在本乡本土能直接为农服务的人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这就向农村教改提出了新课题。”

这确实是个新课题——农村教育要不要为农服务的课题。作为领导干部，吕老是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感触到这一课题的。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吕老到上海市奉贤县四团乡夏家村搞调查。那里的村长是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有干劲，也有见地。他不只会办农业，也会办教育，村里办的学校校舍明显比其他地方的好。吕老问他：“你们这里的学校怎么办得这样好啊？你是怎样想的呢？”

小伙子坐在吕老对面，讲得很实在：

“你们搞教育的喜欢算百分比，100 个学生教好 99 个，你们认为很不错了，落选的只是 1%而已。可是，你们是否知道，现在农家也已都是独生子女，你那个 1%，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家庭中，可就是 100%啊！如果一个孩子没学好，这个家就 100%的没希望。这样一想，我就怎么都要把学校千方百计地办好，聘用好的教师，聘用好的校长，目的就是为了 100%地对农民及农民子弟负责。”

说了这段话后，这位年轻的村长又说了另一段话：“我虽然这样做了，但现在农村教育仍然问题多多，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为了发展农业，我们村里办起了养鸡场、养猪场，却没有懂技术、有知识的人来管。是不是我们没有培养出人才来呢？也不全是，问题出在‘庙小留不住大和尚’。一些学有所成的年轻人，自视甚高，都远走高飞了。说句笑话，这些年我们为国家输送了人才，却为自己留下了庸才。”

吕老听了这个村长说的话，很受感动。他觉得这个地位卑微的农村基层干部说的话，比那些大人物说的长篇大论更有眼光，更有战略思想。也更符合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按吕老的体味，这位村干部说了两层意思：一是农村教育要顾及全局，要创立 100%的业绩，这也可以说是个均衡化的问题吧！二是个更尖锐更深刻的问题——农村教育要为农服务的问题。离开了为农服务这个主题，农村教育就会走到斜道上去。

要研究、探索这一问题，吕老亲自在上海青浦的赵屯抓了个点。“赵屯”，据说还有些来历，一千多年前宋高宗赵构迁都江南，曾屯重兵于此，故有“赵屯”之名。这样说来这里也算是颇有出典的历史故地了。可这些并没有给赵屯带来好运，赵屯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穷乡，地处穷乡的赵屯中学也只是属于中下水平的农村普通中学。吕老到了那里后，实施了一些改革措施：初三分科，大幅度地削减了一般性学科知识，增加了大量与农村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知识。由于学有所用，大家的劲头就上来了。试行的第一年，就消灭了“流生”现象。后来，吕老又在赵屯推行四季草莓种植，先通过科学院引进技术和种子，在赵屯中学试种，然后推广到全乡。学生们既学到了文化和技术，又为家乡致富创造了条件。赵屯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草莓之乡，穷乡的帽子也由此彻底摘除了。一个学生还把草莓种到了非洲，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呢！

吕老根据在南汇、青浦等地的实践经验总结出的“农科教统筹，普职成结合”的思想，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之中，在全国得到了推广。他倡导“一所小学富一个村，一所中学富一个乡”的通俗说法也不胫而走，为更多的人所乐道和赏识。

5. 吕老是务实的。面对中国大量中学毕业生升学无望、就业无能、生存无着的现状，他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高招——“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吕老为职业教育涂上了浓浓的人文色彩。

1979 年，吕老在《人民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势在必行》的洋洋大文。该文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犹如一声春雷，催发了职业教育在中华大地上的萌生，仅上海一地，一下奇迹般地兴办起了八十多所职业学校，而且办得红红火火，发展势头十分喜人。

解放后，曾经根据苏联模式办起了一些中专、技校，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些学校都停办了，只剩下清一色的普通中学。普通中学是与大学接轨的，就我国的实际而言，哪有那么大的实力办那么多

的大学呢？就是像上海这样经济文化实力雄厚的国际大都会，当时也最多只能将50%的高中毕业生吸纳进大学的殿堂，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农村，问题就更严重了。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升学无望，就业无能，生存无着，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怎么办呢？只有从中等教育结构上去找出路。再说，国家已经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急需大量的中等水平的科学技术人才。吕老的《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势在必行》文章的发表，可以看成是一种顺乎时代潮流的大声疾呼。

吕老是得风气之先的。1978年12月，他就带着考察教育的使命跨出国门，使他有机会实地亲眼看世界。他最早到达的是东欧的罗马尼亚和西欧的法国。

法国是技术王国，技术王国的职业技术教育简直让人神往和惊叹。法国初级中学设有一个冠名为“方向指导教师”的专职教师。这名专职教师专门负责指导学生的发展方向——你是朝升学方向发展呢，还是朝职业类方向发展。他在研究学生档案、学生实际能力的基础上提出意见和建议。讲不讲由他，听不听由你。由于“方向指导老师”的工作做得过细，学生一般都还是听的。吕老曾对法国南部一个名为图卢兹的小城市的一名学生进行过详尽的查询和盘问。

吕问：“老师给了你建议信吗？”

生答：“给了。”

吕问：“内容是什么，可以透露一下吗？”

生答：“可以的。老师说我学业基础不怎么样，而动手能力强，初中毕业后可以去学一门适宜的相关技术。”

吕问：“学什么呢？老师讲得具体吗？”

生答：“很具体。老师建议我去学做皮鞋。”

吕问：“对这样的建议，你的父母会同意吗？”

生答：“为什么不同意呢？能发挥我的特长，能对社会有用，会不同意吗？再说，我们这里又是皮鞋之乡，这方面的人才现在又后继乏人，干这一行大家是会很高兴的。”

这就是《吕型伟文集》中的“图卢兹”答问，它给了初出国门的吕老太多的兴奋，太多的思考，当然还有太多的启示。

中等学校的学生应不应该分流？分流后社会（包括学生本人、家长以及其他人）是不是能接受？分流后进入职教领域的学生是否同样大有可为？怎样去评判一个人的出息和前途？这些曾经长期困扰教育工作者也长期困扰家长的问题，似乎都在“图卢兹”答问中有了答案。

吕老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说过：“我是一个教育方面的政府官员，但我更是个思想者，我的长处在于思想。”这该是这位老人的肺腑之言。他由学生分流后，职校生同样可以成才，引发出四句被世人认为特别经典的话来：

“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

话是这样说，人家信不信呢？要人家信，需要样板，需要标本。在一段时间里，吕老在刚建立起来才不多几年的职校中寻访样板，制作标本。为的是说服更多的人，为的是制造舆论、形成气候。

找到了，找到了。样板找到了。标本找到了。

有一对夫妇，都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他们拥有一个活泼、可爱、灵巧的儿子。他们的初衷当然是希望儿子能继承渊源家学，由高中而大学，由大学而硕士，由硕士而博士，最后出国深造，成为一代学人。可

是，偏偏这个宝贝儿子不“争气”，其他什么都好，就是学业成绩不怎么样，最后考上了黄浦区的一所旅游职业学校，落实在厨师班里学习制作点心。夫妇俩大为生气，说：“这事传出去，岂不让亲友笑掉大牙？”吕老知道后，亲自找上门去，对这对夫妇说：“时代不同了，只要有专业精神，干啥都会有出息的。孺子可教，他对点心专业学得投入，我看是会有所造就的。”

夫妇俩将信将疑，默默以对。后来，这个孩子在老师的指点下，在同学的鼓励下，自己又手巧心灵，果然学得很出色。他制作的点心恰似艺术品，小巧玲珑，惟妙惟肖。在一次技术比武中，他的作品得了个大奖。这时，吕老再跟其父母沟通，就有了更多共同的语言。吕老对他们说：“当年他考取了旅游职校，你们不乐意；分配当点心师，你们更不乐意。现在怎么样？我敢打赌，你们这孩子将来是会出国的。以前你们希望他出国，不过是让他出去留学，而现在出国是以专家的身份。中国是烹调业的故乡，只要你孩子有真能耐，国外哪所名牌大学、哪个五星级大宾馆不下聘他当客座教授？”

一席话，说得两教授乐不可支。后来的事实果如吕老所言，这孩子比他父母还有“出息”呢，作为著名点心师的儿子成了教授父母的荣耀！

这样的样板和标本，何止一二？吕老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手中有样板，胸中有理论，他所倡言的东西，顷刻之间能为人们所接受，其奥秘就在于此吧！

6. 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官员曾经为了解《学会生存》一书，对中国的阅读状况由北到南地兜了一大圈作调查。正当他怀着失望的心情准备离去的时候，吕老站了出来。他头头是道地述说了该书的内容，并指出其不足之处。这使该官员大为吃惊：中国也有如此重视教育国际交流的官员？吕老回答道：“我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副会长，当然重视国际交流。”

1978 年。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祖国大地，人们开始感受到了丝丝春意和阵阵暖意，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却尚未从严酷的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多少年外界的封锁，“文革”期间 10 年的自闭，使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外界还所知甚少，更说不上对外交流了。但是，在中国也有不少先知先觉者，吕老大概算是一个。

我们得从发生在这一年春夏之交的一则故事说起。

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职官员，兴冲冲地来到了具有非凡魅力而在当时还有着相当神秘色彩的中国。他是为一本书而来。一本由联合国牵头编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价值的《学会生存》而来。为了了解这本书的影响力，这位官员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世界上几十个主要国家。在那些国家，都有此书的译本，阅读者也相当广泛。联合国的官员们是满意的，因为通过这本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终身教育”等观念正在深入人心。

这位官员来到了北京、西安、南京，由北到南转了一大圈。他有点心灰意冷。在中国，虽然也有该书的译本，但真正读过这本书的人极少，连一些司职于教育部门的官员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他连连地摇着头说：“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

他的意思是清楚的：一个自称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为何这样没有文化呢？为何对世界的前沿文化如此麻木不仁呢？

最后，这位官员来到了上海——也就是他行程中的最后一站。

上海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决定在上海物色能使这一联合国官员获得较为满意答案的人选。

事情似乎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吕老身上。对此事，吕老早有耳闻，他欣然答应去锦江饭店面见这位心情并不畅快的联合国官员。

一阵寒暄后，吕老马上不失时机地切入了正题："听说您对中国没有多少人了解《学会生存》一书，表示了不满和惊讶？"

官员回答："是的。《学会生存》一书出版那么些年了，而我在中国竟找不到一个认真读过它的人，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吕老提高了声调，"在您看来，这似乎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您要知道，您所说的不可思议是由另一种更为不可思议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我们被别人包围着，我们被别人封锁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中国差不多与世隔绝。对这些，作为联合国的官员，如果不了解，或不理解，倒应该说是不可思议的。"

听吕老这么一说，这位联合国官员若有所悟地轻声"哦、哦"两声，然后颇为歉疚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大概我说得有点儿过分了。"

吕老还是不依不饶，说："您说中国没有人了解、熟读《学会生存》一书，据我所知，也不尽然。"

这位官员的兴味显然被吊起来了，急切地问："吕先生，这个了解和熟读了《学会生存》一书的人，他在哪里？请您告诉我。"

吕老哈哈大笑："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对《学会生存》有所耳闻，甚至可以说有所研究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坐在您对面的鄙人。"

联合国官员愕然了。

吕老真不含糊。他逐章逐节地讲述了《学会生存》一书的基本内容以后，对该书的长处作了概括，又指出该书的若干不足。特别是指出该书对中国的种种误解。最后，吕老以征询的口吻向对方请教："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联合国的官员，见多识广，讲得不对之处，敬请匡正。"

这位官员连连说："说得精到，说得精到！"

事情似乎该就此打住了，可是吕老并不愿意就此打住。"来而不往非礼也"。前面对方将了他一军，他也想将对方一军。他说："请问，您知道世界上第一本教育理论书是哪一本吗？"

对方被问得茫然不知所措，说："不知道，我倒要请教。"

吕老说："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您，世界上第一本教育理论著作是中国人写的《学记》。在这部书中，明确而精到地说到了教育目标，说到了师生关系，说到了教育和教学方法，它的问世至今已有三千来年。在古代，不管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如此系统地论述教育的。"

这位联合国官员听了吕老的讲述，说："今天我才知道了中国教育的伟大，中国人民的伟大。"临别，吕老送给这位官员一本《学记》。送走联合国官员后，吕老马上关照上海的出版社组织力量翻译《学会生存》一书。中国人不能只吃祖宗的老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啊！

吕老的这次与联合国官员的交谈，基本上锁定了吕老在国际合作办学方面的观念与模式。即在对外交往中，要充分地吸收国外优秀的教育教学成果，并适时地把这些成果转化为自己的肌肤与血肉。在30年间，吕老到过欧美主要的发达国家，参观了各国的教育教学设施，了解了不少外国的教育思想，在自己的实验基地中加以实施和消化。

同时，在国际合作中，吕老从不对中国的教育和文化自卑自抑，而是如实地向世界介绍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次会议上，吕老常常向国外朋友介绍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以增强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

国际的交流是重要的，但在吕老看来，更重要的是要开发中华文化的宝藏，尤其是弘扬和光大中华传统美德。正是出于这种观念，他出面主编了《中华传统美德五千年》和《世界传统美德五千年》两书。两个“五千年”正好雄辩地说明了吕老观念中的国际交往是怎么回事。

作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副会长，这些年来吕老多次率团外出。外出期间他总是既坚持学习国外经验，又坚持宣传中华文明。“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说是国际交流协会，怎么可以只出不进或只进不出呢？

7. “文革”前，我们这样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一个七十来人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改革开放后，在吕老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上海创设了全国第一所教科所，区县、基层的教科所也相继成立。

教师历来被称为“教书匠”，把教科书上的东西讲清楚，讲述得正确无误，通常就被视为好教师了。至于教育科研、教育创新，在传统教育中是不提倡的。中国古代还说什么“代圣人立言”，教师能把古人、前人、他人、圣人的话说透、说好就了不起了，是不用说什么自己的话的。

吕老却不这样看。他认为，教师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应该说出自己的话。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主张。1994 年，上海教育杂志社创办了一本名为《教育参考》的杂志，有关领导请吕老题词，他就写了一篇千字短文。他在短文中写道，我感到要重唱《国际歌》。《国际歌》中有一句话很重要，那就是要求大家“让思想冲破牢笼”，吕老说：“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如果还死抱住老框框不放，不让思想冲破牢笼，不解放思想，就很难突破目前的状况，也就无法搞好教育。”他为杂志写下了两行大字：

人云亦云不云
老生常谈不谈

不要以为这话只是对办刊人说的，他是在教育界提倡一种敢想敢说的科研精神。我们在怎样搞好教育上的确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全靠我们通过科研去发掘，去创造。如果我们不去搞教科研，只能随俗地去说些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那样对教育何益呢？

吕老希望有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文革”前，像我们这样有十多亿人口的堂堂大国，只有一个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而且包括工勤人员在内，只有七十来人。在“文革”期间，这个小得可怜的教科所也被不留情面地砸烂了，可见教育科研在人们心目中是那样地没有分量。

在吕老看来，教育科学是一门十分复杂也十分尖端的科学。说它复杂，是因为这门科学不只要研究人的发现、培养、发展、完善，还要研究社会。说它尖端，是因为教育科学比研究宇宙科学更宏大，比研究质子、夸克更微观，教育科学的许多领域其实还在我们的认识领域之外，要求我们去花力气探索。而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耽误了几十年。不能等了，我们得赶快赶上去。

在吕老与他的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办起了我国第一个省市一级教育科学研究所。接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恢复了，人员发展到几百人。各省市也相继办起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有的地方，地县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